

制度优势加上改革开放 40 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减贫成绩备受世界瞩目。从消除绝对贫穷到消除相对贫穷，脱贫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让脱贫方式多了一种选择，而人工智能对人力的替代又潜在影响着脱贫成果。全面脱贫之后，如何防止返贫，金融业可以多一些行动。

贫 穷

的 终 结

文 | 本刊编辑部

2000年9月，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包括中国在内的189个成员国庄严承诺，在2015年前实现8项发展目标，又称千年发展目标。目标的第一项就是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对这个目标的评定有两项：从1990年到2015年将每日低于1美元的人口减半，将挨饿人口减半。而1990年全球贫困人口为19亿人。

2015年7月，联合国发布《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报告显示，全球贫困人口从1990年的19亿人下降到2015年的8.3亿人左右，其中中国贡献超过70%。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罗兰德曾说：如果没有中国脱贫工作的成功，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恐怕难以实现。

中国对世界减贫贡献如此之大，那么中国的扶贫模式能否复制到其他国家呢？《经济学家》对此表示了悲观的看法。

模式：精准扶贫，以民为本

中国经验可以为世界减贫工作所借鉴，但很难被复制，主要的原因还是制度与理念的不同。

对于脱贫，西方许多专家多聚焦两个问题：脱贫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市场？穷人是否可以受益于民主制？

联合国顾问、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顾问杰弗里·萨克斯的回答是：贫穷的国家之所以贫穷，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往往都气候炎热、土地贫瘠、疟疾肆虐，如果没有大量的原始投资来帮助解决地方性问题，这些国家很难提高自己的生产力。萨克斯在其2005年《贫穷的终结》一书中提到：如果富国在2005年~2025年间每年拿出1950亿美元来援助穷国，那么贫穷问题到2025年年末便可完全得到解决。

曾在高盛投资及世界银行任职的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并不这么认为，她在其著作《援

脱贫工作越往后越是在啃硬骨头，需要更有针对性的方法，手榴弹炸跳蚤是不行的。

助的死亡》一书中提到：援助使人们停止寻找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腐蚀地方机构并削弱其作用，导致一些援助机构形同虚设。对于贫穷的国家来说，最好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只要有自由市场和恰当的激励机制，人们就能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相比于上述这些宏大问题的讨论，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得主中的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夫妇通过对诸多贫困家庭的走访和减贫实验，写出《贫穷的本质》一书，他们发现很难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与那种西方专业发展经济学家及政策制定者对于贫穷的看法联系起来，因为致贫的因素太多样，很难用一个单一理论来描述。

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的走访地也包括中国，即便书中着墨不多，我们可以比对到书中提到的部分问题在中国也有发生，应对方式是精准脱贫。

早前的中国也通过西方流行的救济方式开展脱贫工作，后来发觉治标不治本，遂采取开发式扶贫，即动员、鼓励、引导贫困地区人民，通过经济发展达到脱贫目的，借着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之势，中国的脱贫成绩世界瞩目。资料显示，1978年~2017年，中国经济连续39年年均增速9.5%，在此过程中，中国7亿多人口摆脱国际贫困线标准。

脱贫工作越往后越是在啃硬骨头，需要更有针对性的方法，手榴弹炸跳蚤是不行的。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新阶段，提出了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目标任务，确定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所谓精准扶贫，就是要帮准人，即识别出那些最贫困最需要扶持的人，分析致贫的原因并精准安排扶贫项目，合理使用资金。采取的方式就是通过建档立卡把贫困人口找出来，再由驻村工作队、乡村干部、第一书记进行调研，有针对性帮扶。目前扶贫干部累计

300 多万人。

在脱贫过程中，中国关于贫困的标准线也在提高，从 1986 年的 206 元提高到 2008 年的 1196 元，再到 2011 年年底的 2300 元。中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从 2012 年年底的 9899 万人减少到 2018 年年底的 1660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10.2% 下降到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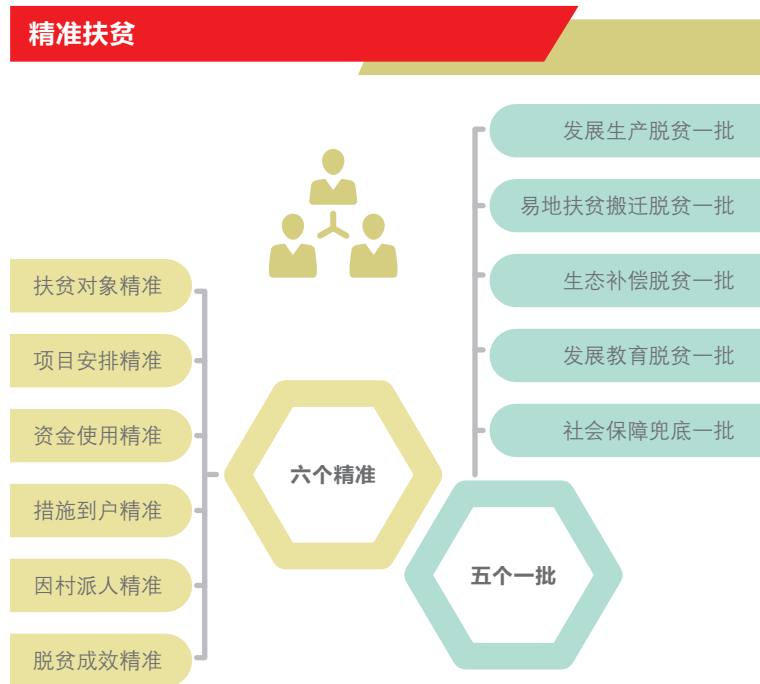
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看来，中国扶贫的巨大成就是在民本主义的指导思想下实现的，中国的经验也表明，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把改善民生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与西方国家在非西方世界推动的发展模式相比，西方的做法是把自己界定的所谓民主化作为发展成功的关键所在。这种做法现在被中国经验证明是靠不住的，因为追求“为民主化而民主化”的东西，导致无休止的“党争”和各种各样的宗教、族裔、民族、地区矛盾和冲突大爆发，甚至陷入无政府和战争状况，消除贫困变得遥遥无期。

中国“以人为本”这个理念纠正了西方人权理论长期存在一个严重的偏差或者缺陷：他们只重视公民政治权利，而不重视民生权利。这也是其他国家难以复制中国扶贫模式的原因。

技术：一枚硬币的两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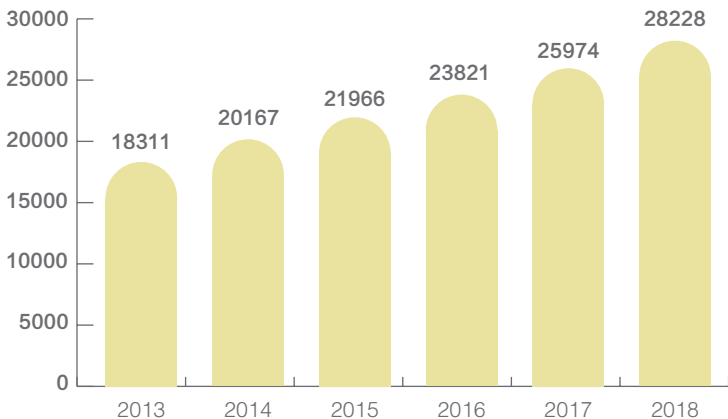
在 2018 年中国社会扶贫网成果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办信息中心副主任刘翔现场展示了如何利用互联网来解决社会扶贫的痛点，具体就是中国社会扶贫网通过国家建档立卡大数据库，主要针对已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展了一系列精准的帮扶、对接、众筹工作。通过云计算技术对贫困户致贫原因、帮扶需求、爱心资源进行分析，研发“社会扶贫大数据”系统，可实现线上大数据校验、线下扶贫干部精准审核、

精准扶贫



2013 年 ~ 2018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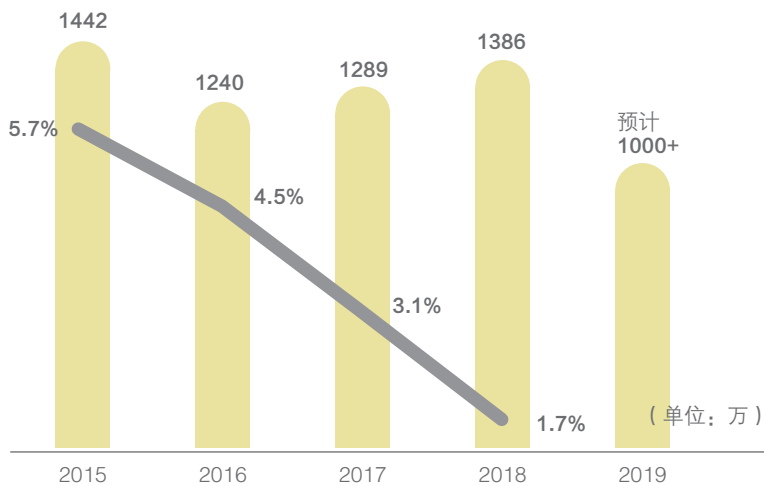
(元)



我国实际脱贫人口数以及贫困发生率变化

(2015~2019年)

● 贫困发生率(当年年底) ● 实际实现脱贫人口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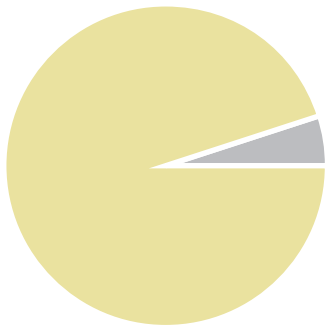
截至 2019 年底
“三区三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已减少至

43 万

贫困发生率
下降到

2%

全国排查出未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520
多万人目前
500
万人
已得到妥善解决

社会爱心资源的精准供给。

其实,在扶贫这条道路上,到处可见新科技和新业态的影子。

2019年1月,主播薇娅 viya 在其直播间进行了一场2小时农产品直播,超过14万笔订单成交,引导销售额近600万,累计观看人次达100万。来自20个贫困县的12款商品售罄,其中大名香油2万瓶销售一空,宽城板栗10秒钟被秒光,内丘富岗苹果销售超过20万,安心鸡蛋销售超过40万枚,涉县黑枣销售4万斤。

在云南漾濞县,90后女孩丁秋累不甘心在核桃丰收季后当全职主妇,通过淘宝直播带动2万妇女剥核桃,连94岁奶奶也参与到直播中。最终通过淘宝销售出去170吨核桃,成为当地的一个传奇。

中国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消除贫困极为有效的手段,许多贫困地区的百姓通过互联网把自己家乡的土特产品推荐和销售出去,彻底摆脱了贫困,这是技术对脱贫工作的促进作用。

但谈到另一项技术——人工智能(AI),对于脱贫就不仅仅只是促进和惊喜那么简单。

一方面,人工智能在提供公共服务和教育方面大有作为,弥补了因物理距离而产生的信息鸿沟,做到扶贫也扶智。

百度的“网络扶智计划”,就是与安徽省、江西省、贵州黔东南地区、云南省等多地开展合作,探索出人工智能与教育扶贫深度融合的新路径,为贫困地区的师生送去知识、图书、教师、教研和先进科技,用知识帮助他们走出贫困。通过“智慧课堂”,教师可免费使用系统内的教学课件,以及百度百科、文库、教育等产品的内容资源。通过VR数字博物馆,从世界上最高的小学——西藏山南市雪沙乡完小,到祖国西端喀什地区的双语学校,再到井冈山革命老区的红色小学,学生们都可以“实

地参观”数十座著名博物馆，通过文字、图片、录音解说、立体 flash、虚拟漫游、高空俯瞰等多种方式，走进各家博物馆，丰富知识和视野。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具有渗透性、颠覆性的创新技术会打破原来的技术结构平衡，旧产业迅速衰退，新产业形成的就业效应尚需时日，这就会导致较为严重的就业替代效应。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也得益于低劳动力成本的国际比较优势。然而人工智能新技术变革使得大规模批量化生产让位于大规模定制生产，后者通过应用大数据和智能设备，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取优势。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在人工智能时代将变成劣势，“人口红利”将让位于“人才红利”。而目前我国的产业扶贫模式中，人才红利并不显现，许多工作将很容易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替代。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经济学家估计，美国有大约一半的工作，包括数百万个白领的岗位，都很容易由于技术进步而消失。显然，技术带来的就业替代，不是单个国家的难题，需要世界各国来共同应对。

资本：防止返贫的一道屏障

2020 年 1 月 7 日，江苏省两会召开，省政府在关于脱贫攻坚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中提到，江苏省脱贫率达到 99.99% 以上，目前还剩 6 户、17 人未脱贫。消息一出，就有网友提出，江苏省贫困标准是人均年收入 6000 元，为何不给这 17 个人每人发放 6000 元，实现全省脱贫？

江苏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给出了回答，要解决相对贫困不是简单的输血比如直接发放 6000 元，不是走一个形式上的数字脱贫，而是要通过帮扶实现持续的脱贫内生动力。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全年工

技术带来的就业替代，不是单个国家的难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来应对。

作的重中之重和必须完成的硬任务，脱贫攻坚战目前已经进入全力冲刺阶段。巨大的人力、财力和时间的投入，我们势必会打赢这场攻坚战。

在解决绝对贫困后，解决相对贫困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所以脱贫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2019 年年底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在全国，已经脱贫的 9300 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近 200 万人存在返贫风险。

如果说，在解决绝对贫困过程中，政府和大型央企力量对脱贫的投入，是把贫困人士“送上马、走一程”，而这匹马能否继续走下去、走多远，还需要资本的助力。无数的案例已经说明，缺乏基本的支付结算、信贷、保险等金融服务，会导致贫困户无法摆脱在生产、销售等环节面临的困境。

普惠金融服务的重点对象与脱贫攻坚战的目标人群高度重叠，主要解决三个问题：贫困人口如何获取持续生产生活的资金需要，怎么能够抵御风险以及是否有储蓄投资渠道。

在获取贷款方面，小额信贷是重要的方式之一。在 cc 讲坛上，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提到中和农信贷给村民吴艳伪的 5000 元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小额信贷不能吸储、获取资金成本较高以致最后的放贷成本偏高，它能部分解决农户的贷款问题。目前，各主要商业银行都已经率先成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总行层面都设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并已挂牌运营。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也设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主要为“三农”、小微企业服务。《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 2018》显示，涉农贷款余额从 2007 年年末的 6.1 万亿元增加至 2018 年年末的 32.7 万亿元。

曾有人做过这样的比喻，穷人就像对冲基金经理一样——他们的生活充满了风险，只是收入水平不同，且对冲基金经理不需要承担自

己的全部损失。相互保成为农户抵御风险的主要方式之一，却十分受限。

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大概有 42% 的贫困人口是因病致灾返贫，大概有 10% 左右的贫困人口是在产业方面，因自然灾害致贫和返贫。针对这些过半数的致贫返贫人口，保险有着天然的功能方面优势，可以在国家扶贫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 2018》显示，2007 年~2018 年，中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从 51.8 亿元增长到 572.7 亿元，参保农户从 4981 万户次增长到 1.95 亿户次，分别增长了 10.1 倍和 2.9 倍。

但这并不够。北京工商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杨德勇表示，在过去几年的调研和走访中，他发现很多走访的地方在脱贫致富和产业发展过程中，其实依然急需保险公司的支持，一些地方的农产品保险，大灾保险等方面还是空白或者非常不得力，当地政府和保险公司要做的工作还非常多，提升的空间非常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与 Visa 公司合作研究课题《数字普惠金融助推脱贫攻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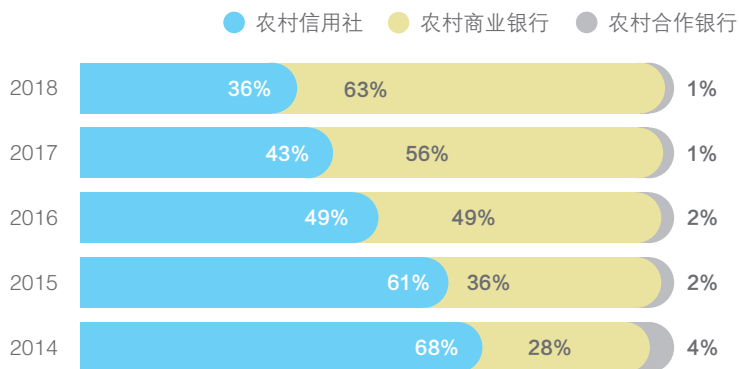
2019 年底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在全国，已经脱贫的 9300 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近 200 万人存在返贫风险。

课题组对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中的 38 个国家级贫困县发放问卷，有效回收了 587 份。问卷结果显示，在特困区金融服务水平达不到平均水平，有 50% 的受访农户表示，在本行政村无法获得金融服务；有 64% 的受访农户希望金融服务能简化手续，以提高金融服务的便利性；有 28% 的受访农户对银行机构的传统金融服务仍不满意。在 2018 年申请贷款的受访农户中，未能通过银行审查的比例达 43%，主要原因是缺乏抵质押物、缺乏担保或没有信用记录；有 29% 的受访农户接受过金融教育，但很初级，针对性、系统性非常有限；只有 14.31% 的受访农户表示，接受过保险服务。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在强化农村补短板保障措施部分，提出要优先保障“三农”投入。鼓励商业银行发行“三农”、小微企业等专项金融债券。落实农户小额贷款税收优惠政策。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按规定享受现行小微企业相关贷款税收减免政策。合理设置农业贷款期限，使其与农业生产周期相匹配。发挥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作用，做大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担保业务。推动温室大棚、养殖圈舍、大型农机、土地经营权依法合规抵押融资。稳妥扩大农村普惠金融改革试点，鼓励地方政府开展县域农户、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加快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银保担”风险共担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推出更多免抵押、免担保、低利率、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产品。抓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落实，督促保险机构及时足额理赔。优化“保险+期货”试点模式，继续推进农产品期货期权品种上市。

用好资本力量，可以成为防止返贫的一道屏障，农户要尝试扩大信息获取渠道，而金融机构要解决信息共享问题。E

2014~2018 年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数量占比情况



(本文由本刊记者张琴琴执笔)